文字的文化节奏：清代广西壮族文献异体字研究

肖博戈

菁英伊利亚特预备学院，美国 新泽西州

摘要：以清代中晚期广西壮族手抄本为材料，考察汉字异体字在边缘区域的保留、再语义化与跨境传播（越南喃字）机制。提出“文化节奏”框架：中心以制度化速度推动正字化，边缘以生活韵律吸纳、筛选与再造，从而形成文字的循环流动。研究显示，壮族地区既是中原文化的受体，也是意义的再生产者；异体字是地方知识与历史记忆的承载体。此发现说明，多元一体格局下的文字变体是中华文明内在韧性与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写照，为当代文化保护与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认同与传承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壮族；异体字；清代中晚期；民族文化；文字传承；文化多样性

1 内含天下的中国：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的互动模式

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根本上源自一种以“天下”为体系的文明秩序。赵汀阳指出“天下体系”不以固定疆界为前提，而依赖可移植的礼制、规范与知识系统维系多民族共在，将国家、文明与历史黏合为一体。[1]即便“天下”作为制度终结，其精神仍内化为国家结构与治理逻辑，使中国呈现出超越民族国家的“文明体”属性。因此，中国的边界可理解为“中华文明所及之地”，而非单纯的地理疆域，因此古代中国的边界是模糊的。

历史材料亦证明此点。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示，历代王朝的版图随中原政权的兴替而动态伸缩，无恒定形态。[2]中国既是国家，也是文明，更是一段连绵的历史，但三者并非同步生成，而是在不同历史阶段逐步汇合。[3]这意味着古代中国的历史疆域、政治版图与文化空间三者是彼此独立，非天然重合。正因如此，中国文明得以延续：广谱而具弹性的文化空间在政治版图变动中，仍维持文化的整体性。葛兆光把中国理解为“核心清晰而边缘模糊”的共同体。[4]这种特点既体现了中原文化的辐射，也体现了边缘文化的吸收与适应。

这一结构在早期政治文化中已具雏形。五服制度以王畿为中心，将周边按距离与义务划分为甸、侯、宾（或绥）、要、荒五等，《尚书•益稷》所谓“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即其要旨。[5]近畿承担直接赋税教化；而边服地带权力密度低，保留了更多地方性。五服既是政治秩序的层级想象，也奠定了文化传播的径向结构。吴飞指出，此框架为理解秦以后中原王朝与周边族群关系提供了关键线索，东亚众多政治—文化形态亦可见其回响。[6]

在本文化框架中，中原的影响力以层级递减的方式向外扩散，边疆地区虽接受册封和规范，但同化强度随距离与时间显著递减。由此形成可经验识别的文化节奏——本文所指“文化节奏”，是制度化与正字化推进的速度和地方在实践中吸纳、再语义化的速度之间的差值。如清代西南少数民族的许多文本仍沿用明代乃至更早的字形与写法，展现出对正字化的滞后接受与地方性适应，这种迟缓并非退步，恰是边缘社会将外来资源转化为本地知识的机制。

更深远的是，“内含天下”的文明特性使文化与政治在历史长时段保持相对分离：王朝的更迭并未中断文化传承，文明意义上的中国始终作为稳定内核延续。该特性既维系中心的整合力，也为边缘文化提供了吸收的空间。例如，清朝少数民族沿用明代异体字，未被视为政治抗拒，而被容纳在文化治理的弹性中。

这种以“中心清晰、边缘模糊”的结构与扩散的机制，正是本文后续讨论“文化节奏”与文字变体存续、再造及跨境流动的理论支点。

2 文化的涟漪：异体字在边缘与中心的流动

在“天下体系”的文明语境下，文字既是知识的载体，也是中心与边缘的可视化机制。本文所称“异体字”，系指在同一语音、语义条件下形体有别的汉字。清代科举与行政文书的标准化将书写导入正字化轨道，异体字逐渐被淘汰或统一，形成了以《康熙字典》为标准的书写体系。[7]与此同时，壮族地区因地理隔绝与文化自主，使异体字长期保留并活化，在民间抄本中获得新语义与权威。

这些材料呈现出由“延续”走向“化用”，再至“外溢”

基金项目：元培少年学者项目研究成果和中央民族大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濒危仡央语支的深度调查与语言文化资源数字化”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编号：22VJXT012）。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的演化链。首先，中心淘汰的形体在边缘继续承担传统语义，维系地方社会中汉文化的韧性；继而，地方实践赋予新义，扩展方块壮字的表达能力并服务民族认同；最终，跨境交流赋予其传播功能与象征意义。因此，异体字在壮族社会并非制度之外的残余，而是承载地方知识与社会记忆的活态资源。

从“文化节奏”的视角看，这是中心加速正字化与边缘缓速吸纳并行的结果。两种节奏的叠合，构成文字在南方的循环流动。以异体字为切口，可观文明的弹性、包容性与边疆的创造力，并重申多元一体的格局。下文据此展开对若干典型形体的文本比勘，讨论其延续、化用与外溢的具体路径及其社会意义。

2.1 汉字异体字的写法与意义保留

壮族地区保存异体字，首先体现在民间抄写传统中，此类文本沿袭中原旧有形体和含义。

例一：靈与灵

广西壮族手抄本《送圣母小儿书》《灵宝升度秘法大全》多见“靈”，其语义场稳定指向“灵验、神祇、护佑”，如道教中的“五灵君”、佛教的“生灵普渡”，与汉地传统用法相贯通，体现宗教语汇的连续性。[8]明代金陵富春堂刊行的《岳飞破虏东窗记》《薛仁贵跨海征东白袍记》等多用异体，刻抄互转，传入边地社会。[9]明末焦竑《俗书刊误》倡导正字化；清代《康熙字典》进一步确定“靈”为正体，晚清官刻与宗教典籍如《玉牒初草卷一》《佛说四十二章经注》大致遵循此一规范，标志着汉族文字标准化趋于精细。[7][10][11][13]

例二：帶与带

壮族地区的《送圣母小儿书》《灵宝升度秘法大全》《祭酒科》频用“帶”，多用于礼制语境，如“冠帶”等，语义与汉地通行用法衔接。[8]《宋元以来俗字谱•十画》引《白袍记》等例，可见其在戏曲与通俗文本传统中的生命力。[15]明末焦竑据训诂与文献用例辨“帶”为正体，而以“带”为俗体，清代官方刻书普遍遵从此分判。[16]壮族抄本对异体字的持续使用，并非单纯的“滞后”，而是面向具体实践的功能性选择。

制度背景方面，明中期至嘉靖年间广西书院建设达到高峰，《广西通志》《广西教育史》载，明代广西书院约七十所，嘉靖新建占半；同期内阁大学士屡请创建书院并获皇帝支持。教育政策与刻书兴盛构成知识与文字的双重供给，使明式字样沉积广西，成为清代壮族社会保留并活化异体字的重要土壤。[14][15][16]

2.2 汉字异体字在民族文献的化用

由“保留”转入“化用”，关键不在于沿袭何种字形，而在于地方书写群体如何把既有形体嵌入自身的语言—礼仪系统，完成再语义化与再功能化。本文所称“化用”，指异体或俗体进入壮语语境后，在词汇、语法或仪式指涉上发生偏移与扩展，而非单纯的替代书写。

例一：晓和晚

该字在《宋元以来俗字谱•日部》据《太平乐府》《取经诗话》《娇红记》等录为“晚”之俗体。[12]在广西文献中，“晚”先以时间义出现，如《灵宝升度秘法大全》所见“晚上”等，维持汉语语义框架；但《送圣母小儿书》“台麻傍圣母，明麻晓父妹”一句中，其语义已脱离原有体系，转入壮语脉络，非单指日暮；同属晚清的广西南部壮族文本《欖桹浪》的“晓隆加魂斗”一句更具地方化特征，表明这个字在信仰实践中获得了新的语义功能。[8]

例二：寺和等

该异体字在《宋元以来俗字谱•竹部》据《娇红记》《东窗记》《白袍记》《目连记》等载录[12]。壮族抄本延续此一习惯：如《送圣母小儿书》“崇嚩十二寺”用作枚举标记“等”，显示语法化的稳定；《祭酒科》“偷床寺咱都”则将其置于口语化语段之中，功能近于类项后缀或集合标记；而《灵宝升度秘法大全》“一门寺众”仍沿袭汉地宗教语体的固定搭配，成为群体称谓的组成部分[8]。这种双重语义的存在，反映了异体字在民族文献中的复杂化用过程。

2.3 汉字异体字进一步传播、扩展

前两节显示了异体字在壮族社会的保留与化用。这一节将视野推进到跨境层面：壮族文献不是传播的终点，而是把旧有汉字形体再语义化后推入喃字圈的中介，与区域书写网络、宗教流动与市集交通共同作用，形成从中心—边缘—域外的文字循环。这一现象表明，少数民族地区在中原文化和东南亚文化之间，不仅是被动接受的一方，更是文化传播的推动者，在文字、语言和文化认同的多元互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例一“寺”：

壮族抄本（如《送圣母小儿书》《灵宝升度秘法大全》《祭酒科》）延续明清通俗文献的省笔写法，进行了再语义化和在地化。[8]与之相对，喃字显示该字在域外获得新的专业语义：《Tự điển chữ Nôm Tày.Nxb》（TĐCNT）词典收“Sí Tắng”（四寺）一词中，释为“六个相等正方面的立体”，并给出“khuôn mần sí tắng…”（“坤门四寺否都”）等例句，表明“该字”由“相同/并列”语义经由“相等的面”而发生概念化转移，进入几何学词汇。[17]这一语义演变过程表明，寺字在传播到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越南文化圈后，经历了地方化适应和语义扩展。这一变化可能源于越南本地文化的需求，促使𠸄字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和意义。

例二“𠸄”

壮族文献中的“𠸄”沿袭汉语本义，常见“举起、推举”之用，亦入宗教语体的仪式用语，显示语义与文体保留并存。喃字材料则呈现音义多向分化：一支保持汉越音 cử（如“cử tạ”“bầu cử”“cử tri”），与“举”的传统语义同源；一支演化为 cữ（“节制/禁忌”，如“kiêng cữ”），显示以音近为纽带对原义的比附扩展；另有 cỡ（“尺寸/规格”）体现从“举—取定”到“度量标准”的隐喻化转移。[18]个别语料（如《Truyện Kiều》《Phần Trần》所据版本）还可见以与该字形近之符号充当 cửa（门、入口）的音借字，这类借写仅指书写策略上的临时表音，与“举”系属义并无直接对应，应与前述语义链区分。[19][20]

3 总结：文字的文化节奏与多元共生之路

清代中晚期广西壮族地区的异体字书写，不仅是文字史中的边角现象，更是文明节奏中的关键节拍。对比汉族主流文字规范化进程与边缘民族手抄体系的差异节奏可见：中心依赖政令与制度推动统一书写，形成“速度”；边缘则依托生活、信仰与仪式缓慢吸纳、筛选、重构形体，形成“耐心”。这种错位非现代意义上的“落后”，而是文化生态中的张力来源。正是在这股力中，部分被中心淘汰的字形得以延续，并通过化用、音借、语义扩展等方式，在跨境文化中获得新位置与意义。

这些异体字并非文化沉渣，而是地方知识、宗教话语与社会实践交汇的结晶。它们不仅传递词汇意义，更承载社群对神圣、祖先、契约与记忆的书写方式。在壮族地区，它们进入祈禳仪式与家谱文献；在越南喃字体系中，则演化为术语标记与语音替代。文字在此不仅是沟通工具，更是认同触媒，是边疆社会将外来文明内化为本土语言的实践形式。

这一观察为当下全球语境中的文化政策与文字治理提出温和而有力的提醒。当我们热衷于语言标准化、字形统一与数字规范时，更应意识到，不同文化节奏孕育的多样性不是阻力，而是文明系统自我调节的机制。保护地方语言与非规范书写，不是固守传统，而是为未来的多样演化保留可能性。异体字的命运，最终不由其“规范”与否决定，而取决于其是否在某个社区的日常、仪式与情感结构中活着。

中心的速度需要边缘的耐心修正其方向，边缘的耐心亦因中心速度而得以显现。二者并非对立，而构成文明呼吸的双向节奏。在此节奏中，文字仍在流动，文化仍在生长。

参考文献

[1][3]赵汀阳.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18.

[2]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4]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M].北京:中华书局,2011:35.

[5]孔安国（传），陆德明（音义）.（宋代刊本).尚书.景鸟程刘氏嘉业堂藏宋刊本（四部丛刊本）.

[6]吴飞.五服图与古代中国的亲属制度[J].中国社会科学,2014,(12):162-175+208-209..

[7]张玉书,陈廷敬等.《康熙字典》.清代刻本,1716.

[8]勾建帅（收藏）.清代民间手抄本若干种：《送圣母小儿书》《灵宝升度秘法大全》《祭酒科》《榄枧浪》等.北京市朝阳区.

[9]富春堂（刊行）.明嘉靖－万历间白话小说：《岳飞破虏东窗记》《薛仁贵跨海征东白袍记》.金陵.

[10]缪荃孙.（清光绪－宣统）.玉牒初草卷一.收录于《藕香零拾》（清光绪至宣统时期刊本）.天津市市立图书馆藏.

[11]金陵刻经处（刊行）.（清光绪十六[1890]）.佛说四十二章经注.首都图书馆藏.

[12]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宋元以来俗字谱[M].中华书局,1930.

[13]焦竑.（明万历）.俗书刊误.明代刻本.

[14]金鉷等（监修）.（清朝）.广西通志.清代监修本.

[15]杨新益,梁精华,赵纯心.广西教育史[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6]蓝武,黄东成.(2019).明代广西书院发展的历史分期、时代特征及其多维成因[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9(2),136－143.

[17]Hoàng,T.Â.(2003).Tự điển chữ Nôm Tày.Hà Nội: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18]Nguyễn,Q.H.(2014).Tự Điển Chữ Nôm Dẫn Giải.Hà Nội:Nhà Xuất Bản Giáo Dục Việt Nam.

[19]Nguyễn,D.(1820).Truyện Kiều.

[20]Anonymous.(Early 19th century).Phan Trần.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